DOI:10.13967/j.cnki.nhxb.2020.0019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因素探析

廖 灵 丹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部署被不断推进,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重要举措。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深层次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一对重要范畴,领导干部与制度规范是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内部因素,如何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维系领导权威与制度权威的平衡关系至关重要。此外,市场经济环境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考验;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挑战;多元社会思潮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冲击等等,都是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可以更好地发现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症下药。

[关键词] 新时代; 党内政治生活; 全面从严治党;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D2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0)02-0015-07

党内政治生活是政党内部最普遍的政治现象,是全党的风向标,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政党赖以生存和长久发展的重要支撑。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政治优势与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法宝。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1]。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与时代的变化,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损害了党内政治生态与党的公信力,破坏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与神圣性。而深入分析这些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因素,找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症结所在,对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发展与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领导权威与制度权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变量"互动

作为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两大重要因素,领导干部与制度规范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一方面,制度的贯彻依赖于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的发挥,在制度规范制定过程中,领导干部能够指导有关制度的研讨、辩论和最终确立,并且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制度规范有助于推进制度规范在全党的贯彻与落实。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的发挥需要以制度规范约束为保障。制度能够规范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以及权力的行使,防止领导干部滥用手中权力、违法乱纪、贪污腐败。一言以蔽之,离开了领导干部的努力,制度权威就不能顺利建立、贯彻和落实;而离开了制度规范,可能就会出现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既要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作用,又要以健全的制度规范作为根本。

(一)制度规范的贯彻依赖于领导干部的主体自觉

党内制度的制定、贯彻与落实离不开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主体自觉。制度是由人制定的,"不仅制度的结构包含有重要的人格决定,而且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人。制度好似堡垒,他们得由人来精心设计并操纵"[2]。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地位、执政使命、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等方面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及制度在制定后能否具有执行力。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

[收稿日期] 2020-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群团组织改革研究"资助(编号:18CDJ014);南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与经验研究"资助(编号:190XQD137)
[作者简介] 廖灵丹(1988-),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对所制定的制度有着明确的认知,那么所设计出来的制度很可能是废纸一堆。而制度制定出来后,领导干部应作为遵守制度的先行者带头做榜样。领导干部遵守党章党规,严格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历史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如果带头遵守党内各项规章制度,是能够在全党起到积极的示范引导效应的。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制度规范的榜样力量,可以扩大制度规范在全党的影响力,有助于增强制度的权威性。

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领导干部也可能对制度建设起反作用。在领导干部与制度规范这对关系范畴中,如果领导干部处于强势地位,就可能会出现无视制度甚至修改制度的现象,而当制度处于弱势被动地位时,就会变成可有可无的一纸条文。党历史上曾出现过违反制度的现象,当前党内也存在一些领导干部违反制度规范搞特权主义的现象,损害了制度的权威性。鉴于领导干部在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关键作用,他们应该自觉遵守制度规范,并根据现实发展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内各项制度规范。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自己岗位对党和国家的特殊重要性,越是身处高位,就越要严格按照党提出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越要严格遵守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习近平明确指出:“在党内,谁有资格犯大错误?我看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一旦犯错误,造成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3]因此,作为党内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对党纪党规心存敬畏,做到在党纪党规面前没有特权并自觉发挥遵守制度规范的垂范作用。

(二)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的发挥要以制度约束为保障

缺乏制度的约束,就容易出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4]。从权力的行使角度来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容易导致腐败。“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5]。要防止领导干部滥用权力,就须用制度来制约。“党内制度规范一经制定,就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强制力”[6]。通过对干部权力行使的过程进行必要限制,可以直接制约干部权力的无限膨胀,包括领导干部权力行使的时间段、空间范围以及行使方式等方面。通过发挥制度的强制性力量来规范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可以将他们的权力限定在制度容许的合理范围之内。良好的制度规范还有助于培养干部的优秀品质,促使干部在合乎制度要求下表达政治意愿和推行政治行为,使干部养成合理使用权力的政治习惯,形成与制度环境相适应的个性、气质。

在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通过党内制度的约束来防止专断性权力现象的出现极为重要。缺乏约束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领导个人专权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会带来严重危害。毛泽东曾公开批评党内干部个人专权行为:“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话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只要是大事情,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认真对复杂情况和不同意见加以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7]领导干部权力滥用往往会滋生腐败。“把政治职位当做致富的工具,意味着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服从于经济价值和制度,政治的主要目标已不是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促进私利的实现”[8]。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内出现诸多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他们趁机钻入制度漏洞,把攥有的政治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甚至不惜牺牲集体利益来满足个人私利。部分地方因为制度建设不完善而导致人治现象时有发生,领导干部的权力弹性很大,制度的贯彻执行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领导干部个人思想觉悟与水平,部分基层党组织的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无视制度,往往借强化集中之名行个人专权之实。“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9]。为此,必须要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选人用人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各项制度,为防止领导干部个人专权和家长式作风设置制度屏障。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正确处理领导权威与制度权威的关系

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的贯彻依赖领导权威,有效合理地发挥领导权威有助于协调党内关系、推进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规范的形成与落实。但是,领导权威的发挥应受制度权威的限制,避免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等不良现象产生。领导权威的发挥必须体现集体领导的特征,要以遵守党的各项制度尤其是民主集中制为前提。我们党的领导权威不是自封也不是恩赐的,而是在不断进行自我修养、不断克服缺点错误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长期的实践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制,党内政

治生活就会积极健康发展,而当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得不到贯彻,党内就会出现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权的现象。坚持党的集体领导,维护党中央的集体权威,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领导权威才是我们党所需要的真正权威。将领导权威约束在制度权威范围内,用好的制度来保障领导权威的合理实施,使领导权威始终运行在正确轨道上,这样才能既防止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权现象的产生,又可以避免滑入无政府主义。

在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下,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与否主要取决于领导干部的个人思想觉悟与作风,而不是制度,势必引起这样一种风险:如果领导人的思想作风好,党内政治生活尚可正常;倘若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问题,就容易滋生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现象,从而使党内民主形同虚设,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名存实亡。领导权威的发挥要限定在制度权威的要求之下,将领导干部权力的行使限制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不断健全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与监督制度,使领导权力置于监督之下。只有完善并贯彻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监督,才能防止领导干部滥用权力。制度规范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保证,有了健全的党内制度规范,并发挥其权威效用,党内政治生活才能健康发展,而不至于出现“因人而异、随人而变”现象。

二　市场经济环境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考验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严峻考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习惯性地将经济效益的好坏和财富创造的多寡作为评判自身价值高低的标准。当这种观念反映到党内时,就容易导致部分党性观念淡薄的党员和干部滋生“一切向钱看”的腐败思想,把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转变为对金钱和财富等物质利益的追求,使自己的党性与人格商品化。在市场经济重利属性的驱使下,部分党员干部成为商品拜物教与金钱拜物教的仆从,他们将手中的公共权力和社会地位转化为攫取物质财富的工具,导致权力异化、商品化及腐败行为的发生。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容易滋生这样一种错误意识,即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他们把经济领域的价值原则与价值规律运用到党内,把追求物质利益作为唯一目标,从而破坏了党内良好的组织关系,使正常的党内同志关系变为金钱关系。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党员干部甚至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正当利益应该得到承认和保护,我们党也认可并尊重党员与干部拥有个人利益,但必须是正当的,要以不损害党和人民集体利益为前提。如果党内成员都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那么党的人民性价值取向就会被扭曲,党的纪律、原则与正常权力关系就会遭到破坏。

市场经济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党内的蔓延。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了,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放大化的市场价值、交换价值与商品价值则把人自身的价值淹没于物的价值之中,“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由此而来。市场经济以利益为驱动力、以货币为中介,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具有交换一切商品的作用,它被视为万能之物,客观上为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条件[10]。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与竞争体制下,每一种市场经济利益主体都力求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使以集体利益为最高取向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受到挑战。在市场经济价值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渗入党内,改变了部分党员或干部的思想与价值观,使一些党员或干部的全局观念、组织观念淡化,进而影响了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部分党员、干部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背离了我们党长期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金钱才是硬道理”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等主流价值观被边缘化。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为了个人利益,他们急于把手中权力变现或寻租,不惜牺牲和损害党和国家的集体利益。他们把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带到党内,拿党性做交易,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只求回报,甚至参加党内政治生活也要先讲条件、谈价格。

市场经济是以遵循等价交换为基本原则的,一旦这种原则侵入党内,就会损害党的健康肌体,破坏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习近平强调,“坚持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品格”[11],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其必须坚持和贯彻党性原则。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并在商品流通中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等价交换原则与党性原则所追求的价

值与所属范畴截然不同,等价交换原则是市场经济主体以追求个体经济利益为价值目标,用于调节市场经济主体之间从事交换行为的价值关系,属于经济范畴;党性原则并不是以追求个体利益为价值目标,而是以集体利益为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为价值取向,它要求党内成员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与党性原则之间本质上的差异性决定了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和贯彻党性原则。而等价交换原则一旦渗入党内政治生活,就会破坏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败坏党内政治生活的空气。当前部分党员、干部把等价交换作为处理个人与党组织关系的"新准则",利用工作、职务之便,搞权钱交易,拿党性作交易,向党组织讨价还价,把本属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当做捞取政治地位与利益的砝码,破坏了正常的党内组织关系。

任何原则只有在与之相对应的领域和范围内才能发挥有效作用,等价交换原则也只适应于经济领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但决不能把等价交换原则放到党内政治生活中去。党内政治生活不同于市场的交换关系,决不能用市场的等价交换模式去干涉党内政治生活。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交易中的商品的质与量对于交易双方来说是确定的,因而可以实行等价交换。但等价交换原则一旦渗入党内政治生活,很容易造成党内价值观混乱,导致党内政治生活商品化。党内政治生活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指导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只能是党性原则。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员的行为要受到党性原则的约束。当前党内政治生活中,部分党员干部利用职位之便捞好处,出现"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不良现象,这既是对党性原则的背离,也是对等价交换原则的歪曲。

三 网络新媒体发展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挑战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与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已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与传统媒体不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新媒体作为新型的传播媒介,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虚拟性、便捷性、共享性等特点和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传播迅速、成本低廉等优势,使网络化新媒体能够迅速吸引大量用户群体,并且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方式于一体,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据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网民数量近十年来增长了近四倍,网民结构以青年群体为主,10~39岁群体占整体网民的65.2%,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青年网民比例最高,占全体网民数量的近24.6%,参见图1、图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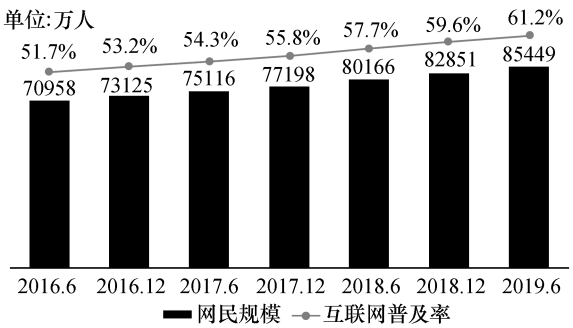


图1 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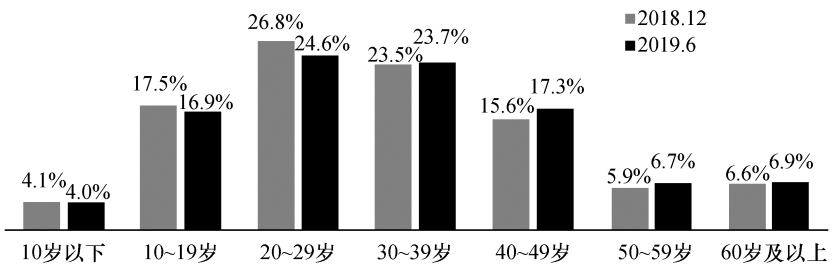


图2 网民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从图1、图2所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出,网络新媒体在我国拥有大量的用户群体,并且呈现上升趋势。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改变着我国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来说,日益发展和壮大的网络新媒体既带来了重要机遇,如各级党组织可以通过网

络来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使党内政治生活在内容形式上更加丰富。同时,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也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严峻挑战,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外部环境。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网络新媒体用户群体越来越广,尤其是青少年用户成为主要活跃群体,他们由于阅历尚浅,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处于形成时期尚未健全,政治立场不坚定,面对网络上良莠不齐、真假不一的信息容易困惑,极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蛊惑、煽动和利用,导致他们在网上发表一些过激言论或在现实中出现一些极端行为。随着用户群体的增加,网络新媒体也日益成为民众情绪的“发泄地”与社会矛盾的“发酵池”,党内政治生活开展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影响党组织的公信力,甚至引发党群矛盾。

第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挑战党内政治生活理论的有效传播。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理论基础。信息化时代,网络化传播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远大于传统传播媒介,网络新媒体成为了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集散地,各种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在网络上流传,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一些政治定力不强的党员、干部很容易被这些非主流价值观所迷惑。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不同,网络新媒体传播不受印刷、运输与发行等因素的限制,加快和拓展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网络新媒体传播这种高效性的特点,使得各种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能够在短时间内广范围地传向用户群体,而且信息量大,传输速度快。在网络化时代,各类信息可以通过图像、文字、声音、视频等方式以更快速度、更少资源、更好效果传播开来。网络新媒体的这些传播特性使党员接触的信息、思想与文化也呈现多元化趋势,这对党员如何保持自身政治定力提出了挑战。

网络新媒体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虚拟性,使得网络信息舆论引导和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网络新媒体在传播方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信息传播的双向交互性,它在大众传播中实现了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任何一个信息接受者,只要他愿意,都可以及时转化为信息发布者,并把他所创制的其他类型信息模式输入网络,反馈给原有信息模式的发出者或更多的用户群体,从而产生一定影响”[13]。网络新媒体的用户主体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等媒介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观点,通过用户之间的互动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形成所谓的民间“意见领袖”,他们通过输出自己的观念掌握着一定的网络话语权。部分不怀好意的民间“意见领袖”往往散布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抹黑党等错误思想言论,这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出了严峻挑战,甚至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一些不明真相的党员与群众往往容易被这些错误的言论所蛊惑,影响了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此外,国外一些敌对势力也利用网络媒体的技术优势对我们党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和思想文化渗透,企图对我们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和党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产生负面影响,使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党和人民中的吸引力与公信力降低。

第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考验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形式。网络新技术的运用突破了地域限制,对传统的党内政治生活组织形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民主集中制一直是党内政治生活所要遵循的重要组织原则。然而信息网络传播的迅速性和不确定性突破了传统民主集中制的运行限制。网络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传播渠道之多、传播内容之多元,使我们党无法完全对各种信息源做到有效管理。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都可以通过网络传播,影响着党员群体,信息的多元化使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的难度加大。在信息网络化时代,党员的流动性增强,这对于落实集中统一的传统党内政治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导致党内政治生活无法跟上党员活动的尴尬局面,从而削弱了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淡化了党员的组织观念。随着网络新媒体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党的组织管理机制由垂直的倒金字塔型趋于扁平化,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组织管理效能[14]。但是,也正是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党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流动性党员的组织增多,弱化了党组织的集中统一性,使党员与党组织之间出现个性化、多元化和非组织化的倾向,影响到党组织的正常管理,增加了党组织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难度。

四　多元社会思潮传播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冲击

社会思潮是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对应,在某一时期内某一阶层和群体中影响较大、流行较广的一种理论观点和思想潮流[15]。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是不同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并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社会思潮涌入,对我们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一定冲击,一些社会思潮蔓延到党内,增加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难度。尽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党内仍占主

导地位并不断得到巩固,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也在不断滋长,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等。这些社会思潮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如价值观茫然、价值观错位、价值观断裂、价值观虚无等问题,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歪曲党的指导思想与党的各种理论创新成果。

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都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导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理论,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占有主导性地位。习近平也强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6]。然而随着多元文化环境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倒逼”之势,各种带有鲜明异质性色彩的社会思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冲击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思潮之一的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们党和国家影响巨大,它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极力鼓吹个人主义,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认为集体主义限制和扼杀了个体的发展。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与否定,必然会导致集权主义。新自由主义极力坚持西方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观,宣扬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其本质是要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内的指导地位,企图用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改良主义思潮的民主社会主义,对党内政治生活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他们试图曲解我们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统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以便造成党内思想混乱。

历史虚无主义也是当前对我们党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其本质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和历史规律进行全盘否定,并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别有用心地否定和虚无一些重大历史,夸大历史选择的偶然性,并按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虚构和解释历史,其背后逻辑就是只对历史事实作价值判断,而不做事实判断。当前所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们党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否定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绩,否认党内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对党所做出的贡献,片面夸大党在历史上的失误以及个别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企图以否定我们党在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来达到欺骗部分党员和人民的目的,从而对党和国家的稳定性造成影响。此外,“新左派”思潮从“左”的方面给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在历史认识、问题解决方式、意见表达方式等方面都表现极端主义态势,企图“召唤与留恋平均主义和过往传统体制,幻想中国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状态”,并一直“将自己装扮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并不假思索“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及其诘难新自由主义的学说转移到中国”[17]。他们宣传社会的完全平等并借助网络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社会效应并影响到党内,对党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一定冲击。民粹主义思潮以“妖魔化他者与自我神化”[18]的话语特征,强调极端化的平民倾向,忽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借助当前社会所存在的贫富不均的现象来煽动社会仇恨并产生社会影响,一旦这种思潮蔓延到党内,就会成为引起党的不稳定性的隐患。

社会思潮基于一定社会现实背景而产生,并立足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给予某种回应,从而能够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度,而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与欺骗性,一些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认识的人往往容易被误导。社会思潮的价值主张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对立,决定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社会思潮的传播,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社会思潮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如果蔓延到党内,就容易引起部分党员、干部价值观的扭曲或混乱。当前党内存在部分党员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动摇的现象,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淡化,更有部分党内同志以“信仰自由”为名抛弃了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不信马列主义而信鬼神。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功利主义价值观,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变成为人民币服务的理念。受西方思想影响深远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大肆兜售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企图通过理论、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渗透,使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动摇,企图以西方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的指导地位,扰乱我们党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格局,从而达到分裂我们党和社会的目的。因此,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总而言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而优良传统作为一种历史积淀,是对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党的重要优势。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对促进党的建设与发展发挥巨大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壮大,离不开党内政治生活建设。

正是因为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视,我们党才成为一个有强大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党,我们党才能在复杂形势下克服困难、化解矛盾,纠正错误倾向,保持健康积极向上的状态。因此,新时代我们党要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遵守党内各项制度规范,同时,在党内政治生活建设中要警惕各种不良因素的侵蚀。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9-11-1(1).

[2]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 1 卷[M].陆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46.

[3] 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95.

[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54.

[5]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 建,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2.

[6] 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24.

[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5.

[8] [美]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67.

[9] 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3.

[10] 陈先达.哲学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35.

[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03.

[1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9-08-30)[2019-12-05].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

[13] 邬 焜.论人类信息活动方式与文明形态、价值观念变革的一致性[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4.

[14] 肖光荣,黄建国.信息化对党的组织建设影响及对策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5):72-77.

[15] 佘双好.当代社会思潮的内涵、特征及其研究意义[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9):7-11.

[16] 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9.

[17] 卞建华.当前社会思潮的传播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54.

[18] 杨 阳.民粹主义情绪热度与价值诉求[J].人民论坛,2014(4):56-58.

Analysis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CCP's Internal Political Life in the New Era

LIAO Ling-d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rigor in the internal politicial life of CCP has been promoted as an important deployment of improving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discipline system. The factor that affecting the internal political life is multifaceted whil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re included. As a pair of important categories,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between leadership authority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s crucial. In addition,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online media and spreading of pluralistic social thoughts are all important influence facors of CCP's internal political life. And analysing these factors systematically could find out the problems effectively and tackle them directly.

Key words: the new era; the internal politicial life of CCP;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discipline system; influencing factors